

安東·諾瓦克

我曾爲 鐵托服務



世界知識出版社

安東·諾瓦克 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4

D 754.3
16

2 029 2156 1

我 會 爲 鐵 托 服 務

安東·諾瓦克著
王家輝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Antun Novak

I Served Tito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September 1951
by Orbis in Prague for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 Culture

我 會 爲 鐵 托 服 務

著者	安東·諾瓦克
譯者	王家輝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十七號
承印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總經理	新華書店
定價	二千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二年九月初版
(1)00001—20,000
書號：0073

原編者引言

安東·諾瓦克是南斯拉夫駐布拉格大使館的前官員之一，他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請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給他避難的權利，因為他對於今天的南斯拉夫政府的政策及鐵托的駐布拉格的大使館的作法不能同意。

安東·諾瓦克的這本小冊子「我會爲鐵托服務」記載了一連串的諾瓦克和他的遊擊隊戰友所遭遇的事情。這些事情構成南斯拉夫過去十年中政治發展的一幅圖畫。諾瓦克所描寫的落到普通人民頭上的事情，沒有別的，只更證明情報局決議內的政治分析的公允而已。這些事情說明鐵托及其集團在很久以前就進行了叛國行爲，把無產階級的勁旅故意送上屠場而這些部隊中的軍官團却好像總是奇蹟似的死裏逃生，證明甚至在戰爭時期，鐵托黨徒已經有意地罪惡地摧毀着南斯拉夫工人階級的優秀分子。

我們奉獻這本小冊子給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大眾，希望他們能用來當爲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工具，因而也成爲維護世界和平的戰鬥中的工具。

目 錄

原編者引言	(一)
作者自序	(一)
我爲什麼參加戰鬥	(三)
關於我留居在布拉格的指示	(九)
國家保安處統治大使館	(二二)
大使館建立了監牢制度	(二四)
南斯拉夫外交人員在布拉格做黑市買賣	(二七)
南斯拉夫工人所不許知道的事情	(二九)
我爲什麼不替鐵托服務	(三一)
我的逃跑計劃成功了	(三五)
鐵托宣傳家的謊言證明了他們自己的罪狀	(三七)
結論	(四一)
附錄	(四三)
編後記	(四四)

作者自序

我從來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更不用說寫書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在爭取南斯拉夫解放的鬥爭中，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我必須用筆去從事戰鬥。我不知道如何用筆，我沒有受過用筆所必需的**教育**。在我整個一生中，我一共上了五年學，而且上的也只是小學校。環境（這以後我將敘說）迫使**我寫這本小冊子**，以便與羣衆作最廣泛的接觸。因此，我懇求我的讀者從內容而不是從形式去判斷這本書。

我談得最多的是我故鄉克羅地亞邦微拉提斯尼克村的一些事情，因為我能舉出那兒我極熟悉的具體事例，以證明鐵托政策的邪惡，並描繪一幅今天南斯拉夫的典型的鄉村畫圖。在微拉提斯尼克，猶如在南斯拉夫的其他地方一樣，人們可以見到過去的遊擊隊員被撤換了，替代他們的是農村中的富農，工業部門裏的冒牌專家，以及從前和匈牙利的和德國的法西斯分子合作過的好細。在微拉提斯尼克，人們能夠見到，鐵托政府怎樣爲它自己建立了一個基礎，這一基礎，與那過去對佔領者作戰期間它所憑藉的絕無相同之點。從我對本地區情況的描寫中，從我對那些仍舊忠於自己的理想——爲了這理想他們在戰時會走進深山叢林去戰鬥——的遊擊隊員的命運的敘說中，人們可以看到一幅鐵托政權的圖畫，它爲誰所支持，爲誰所反對。

在我停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期間，我認識到世界上只有兩個陣營，以蘇聯、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爲首的和**和平陣營**和受英美帝國主義領導的新侵略戰爭陣營。在爭取和平的戰鬥中，我不願當一名旁觀者。

鐵托集團背叛了我們的理想，爲了這理想，我與我的同志在納粹佔領期間，進行了遊擊戰鬥。今天，不是一個加強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權，而是一個恐怖法西斯政權；不是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

友好愛護的政策，而是仇視這些國家而與杜魯門、邱吉爾、艾德禮聯盟的政策。

鐵托是美帝國主義者委派在巴爾幹的蔣介石或李承晚，所以與法西斯鐵托的戰鬥中，我們的主要任務還是爲維持和平而鬥爭。鐵托服役於帝國主義戰爭陰謀者的事實越多地被揭發，那末他在南斯拉夫的政治基礎就越狹窄，要保持政權也就越困難。

斯大林在接見「真理報」記者時明白指出保衛和平是可能的，保衛和平不但是爲了一切國家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且主要是掌握在勞動人民的手中。我們爲解放南斯拉夫脫離鐵托的法西斯獨裁而戰鬥，也就是爲維持世界和平盡了力。

我爲什麼參加戰鬥

我在童年就受到政治教育。我會有過人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治教員。我生在克羅地亞邦麥德哲木里地區的一個農民的家庭裏，窮苦的生活會經教育了我。我的父母耕種兩公頃地（約合華畝三十畝——譯註）。靠這麼小的一塊地，能過什麼樣兒的生活以及還能有多少餘錢來實現我父母畢生的夢想：盼望我和我哥哥將來過較好的生活，也就不難想像了。

不用說，我和我哥哥從小就得幹活，來幫助父母獲得生活上最起碼的需要。在那時候這是不容易的。在三十年代，我才十二歲，就離開了學校。我除掉替富農幫工外，就再找不到別的活幹。一年到頭，我總在希望，至少在夏天裏，我能有幾天在麥爾斯柯·斯律狄斯柯薩山上面的事務所找到工作。我在礦場裏找工作的希望總不能達到。因此，除掉幫助我的父母耕種兩公頃田地外，剩下來我能做的事，就祇有當「苦路」（解釋見下文——譯註）。我父親，像克羅地亞邦所有的男人一樣，每年必須在國有公路上做六天到十天的工。這種強迫勞役叫做「苦路」。富農可以不盡這個義務，改爲繳納現款。像我們的家，這自然是談不上的。所以我就代替父親上公路做工。我做四天工，抵我父親的一天工。

我在學校的時候，老師總對我說，我應當用功讀書，不應當十二歲就辮學。因此我想，我能學會一門手藝也好。那末我就會比我父親日子過得寬裕一些。我曾經想過學做機器匠、銅匠，諸如此類的事，因爲我老是羨慕能在機器上做工。可是工業規模小，不發達，只有很少的孩子能被收爲學徒。如果你不認識工頭，或者你父親送的禮物不夠，你就不會被收爲學徒。因此，我到麥爾斯柯·斯律狄斯柯煤礦的保養工廠當一個學徒的希望，也就成了泡影。

因此一點也不奇怪，我在幼年時代就仇恨那個使驚人連工作的權利都沒有的制度。不知有多少

次，我憤恨異常，然而沒有用處。不知有多少次，我絞盡腦汁問，爲什麼事情會像這個樣子。不知有多少次，我看到我父親情願丟掉他的兩公頃地，到別處去找工做。

這種情形繼續到一九四一年三月底，那時我父親年紀已經四十開外，被徵調到南斯拉夫、奧地利的邊境上去担任軍役。大約八天後，四月六日的早晨，一個星期日，德國人佔領了南斯拉夫。從第二天起，我的家已在德國佔領區之內了。後來過了些時候，德國人換上了匈牙利人。匈牙利就把我們的國家併吞了。

除了憂愁生活外，又要爲生命的安全而憂愁。德國人給我們上貨真價實的法西斯的課程。他們到了我們的微拉提斯尼克後，從第二天起就開始抽人。出賣人民的奸細也露臉了。德國兵到我家搜查軍火，帶德國兵來的是微拉提斯尼克的鎮長普利摩斯，還有牧師克羅德。他們在我家沒有搜到任何軍火，但是他們仍然把我的哥哥米若抓走了。同時他們還抓走維朗昔奇和麥托薩。他們把我哥哥綁起來，放在三輪摩托車的側車中帶走了。

德國人來了之後，我們開始遇到更大的恐怖，比亞力山大國王時候的更壞。人心惶惶不安。人民以新的姿態出現。沒有名氣的普通的人離開了他們的家，跑到山地裏和森林裏，開始了一個激烈的無情的反對佔領者的鬥爭。同時，在村子裏的富農，他們在戰前常用愛國的口號反對我們的共同要求，現在却和希特勒幫幫狼狽爲奸，再一次出賣人民。村子裏的鎮長普利摩斯和牧師克羅德，把有進步思想的村民的名字，告訴給德國人，使這些村民受到迫害；可是在同時，第一支遊擊隊却在山地裏組織起來了。很自然的，遊擊隊的隊員大多數是窮人。他們是爲生活而艱苦鬥爭的人，正像我和維朗昔奇及麥托薩一樣。這兩個人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他們在德國人一來時就被捕去，但是他們設法逃出了集中營，參加了驅逐侵略者的鬥爭。維朗昔奇後來担任了重要而又危險的工作，他担任山地遊擊隊和村裏老百姓之間的通訊員。

法西斯的侵略者大爲冒火。他們把捕到的遊擊隊鎗斃示衆。老百姓有和遊擊隊合作、幫助遊擊隊或同情遊擊隊的嫌疑，就要被逮捕、虐待和送到集中營去。

我的嬸母西蒙尼奇，因爲替遊擊隊做飯，被捕去送到德羅集中營。戰爭結束一年後她才回家，成了一個終身殘廢的人。她的年紀已經七十歲的父親，因爲他把她的牛奶留給受了傷的遊擊隊員，也被抓走。當着我嬸母的面，狠狠地把這老人打了一頓，打得他血流滿面。沒有醫生給老人診治，傷處潰爛，老人終於死了。

我的父親因爲有人告發他同情遊擊隊，也被抓走。家中只留下了我和母親。母親和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我還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孩子。當我和村裏的人談論的時候，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大聲地抗議我父親的被捕。有人控告我。契特尼克（淪陷期間受米海洛維奇指揮的匪徒——譯註）審問我：「毒打我。我被釋放後，就連我母親的眼淚也留不住我了。我不願意驚惶萬狀地住在德國集中營，在那裏我遲早會被打死或至少會被打成殘廢的。我寧願手裏拿着武器死掉。但是在我未死之前，我要爲我的生命和爲我們國家人民的更好的生活而鬥爭。」

這樣我就成了一個遊擊隊員。很運氣，不久我就和一個遊擊部隊取得了聯系。和我一同離開微拉提斯尼克的還有四個人。我們之中的三個人被派到蓋伯克和拉迪奇兄弟領導下的遊擊團。微猶格林尼克和我則被派到薩格勒布的一個青年營。這個青年營後來歸併到「國防軍」第三克羅地亞旅的精銳隊。

遊擊隊裏的軍事訓練是簡單的。逐漸地，當我們不在行軍的時候，就有一個老遊擊隊員教我使用各種武器。我很快地就學會了使用德國自動武器、施邁塞槍、各種來復槍、輕機槍和手榴彈。我的軍事訓練就算足夠了。我們差不多經常在行軍，從來不在同一地點停留兩天以上。

政治指導員利用行軍中每一次的空閒時間來提高我們的政治水平。我們經常閱讀遊擊隊的報紙，主要的是「戰鬥報」、「前進報」和用油印出版的「新聞」，其中主要刊載盟軍軍事勝利的消息。這

種教育雖然不是經常的，但對我們每個人都發生很大的影響，把我們鍛鍊成爲一個真正團結的、精銳的、戰鬥的部隊。紅軍在這次戰爭中的英勇事蹟和革命時期蘇聯人民的遊擊戰爭史喚起了我們的決心，要走他們的道路，要像紅軍戰士和蘇聯遊擊隊一樣，激烈地和成功地打擊敵人。我們常常在戰鬥後唱着歌回來。常常唱我們的克羅地亞的歌，也唱蘇聯遊擊隊的歌。我們彼此互相學唱這些歌。我們自己也創造一些新的歌，一些切合當前情況的歌，用克羅地亞歌詞填入蘇聯的歌譜。

政治教育使我認識了階級利益和認清了我過去的生活。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痛恨過那種使我全家依靠兩公頃地的生活，而一切改善生活的鬥，學校的鬥和教育的鬥都對我關着。我豁然自覺地認清了一切，我也開始從階級的觀點來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和開始依照這個規律去思想去行動。我開始有了仇恨，一種有認識的自覺的仇恨，仇恨德國佔領者，仇恨烏斯塔西匪徒（克羅地亞暗殺匪徒，後爲德國的爪牙——譯註），仇恨我們克羅地亞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僱用的走狗。

這種教育不僅是恨的教育，也是愛的教育。正如我學會了自覺的恨，我也學會了自覺的愛。我學會了愛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鬥爭，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我愛想到我的未來的生活，一個社會主義的人的生活。我期望着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這使我更不甘於耐心地等待着我們戰鬥的勝利結束。

我開始愛紅軍，愛紅軍是因爲紅軍的戰鬥解放了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而同時幫助我們解放我們的南斯拉夫。我愛紅軍，因爲我知道假如沒有紅軍對希特勒佔領者的艱苦的勝利的鬥爭，那末我們在南斯拉夫的勝利的鬥爭就不可能。我們與德國人鬥爭的決心，隨着我們的認識而增加；我們認識到，我們殺死一個希特勒匪徒和奪到或毀掉每一件德國武器，不僅是我們南斯拉夫的解放更接近了一步，也是社會主義的蘇聯的被佔區和其他被希特勒軍隊佔領的國家的解放更接近了一步。我們對蘇聯有無限的愛。我們每次聽到蘇聯軍隊的勝利都高興非常。紅軍戰爭勝利的每一條消息，都鼓舞我

們加強對盤據我國的侵略軍的鬥爭。

我們第一次見到蘇聯製造的坦克，我們是多麼地高興啊！我們一些在塞爾維亞的遊擊隊和在羅馬尼亞邊境附近的遊擊隊，在這方面，要比在克羅地亞的我們更幸運。他們比我們更早地接受蘇聯武器，因為他們和攻入羅馬尼亞的紅軍部隊有了直接的聯系。那些遊擊隊是機械化了的隊伍。他們是用現代化的蘇聯武器武裝起來的。在克羅地亞的我們，卻只有蘇聯的輕自動武器，或者是靠我們對德國人作戰中繳獲的武器。我們在東部的遊擊隊掃蕩退却的德國人，進展到克羅地亞的時候，我們才第一次看到蘇聯製造的坦克、蘇聯的重迫擊砲和蘇聯的大砲。對於我們來說那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那是實現我們偉大理想的開始。蘇聯在他自己對希特勒佔領者作戰中還感到武器不足的時候，卻把武器送給我們，這是蘇聯人民最有力的表示，幫助我們進行鬥爭來解放我們的國家。對於爲解放而鬥爭的南斯拉夫人民，蘇聯的自動武器和大砲贈與表示着兄弟般的援助。

我們政治覺悟的不斷的提高，表現在我們具體成就的增加上。突然之間，我們能够經得起我們以前所夢想不到的考驗。我們所完成的任務，是只有一個有意識的社會主義的戰士才能完成的。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我們接到任務，要我們從薩格勒布以北的卡爾尼克山打到薩格勒布以東的莫斯拉維克卡山。我們需要通過克羅地亞平原上的幾條氾濫的河流。因爲我們必須避免走過村鎮和不能通過公路，所以我們需要強行通過一大段艱難的、氾濫的和泥濘的地區。在不斷下着雨的三天中，我們通過沒有橋梁的河流十六次之多。我們在三天中強渡河流十六次，水深到胸口，還要舉着武器準備迎擊敵人。我們大約有三百個人，其中沒有一個人猶豫過一次。這種生活對於我們的身體來說，比起在戰前在兩公頃土地上幹活還要更艱苦。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生活又是多麼地愜意！一想到我們是在把希特勒匪幫從我國國土上驅逐出去，一想到我們是在爲歷來受壓迫的階級取得政權，一想到我們要使用這個政權以便走上以蘇聯爲榜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想到蘇聯的經驗會使我們的道路走得更容

易些——這一些思想就把身體上疲乏的遊擊隊隊員，變成了生氣勃勃的有覺悟的和自豪的戰士。

最大多數的老百姓站在我們這方面，站在戰鬥的遊擊隊這方面。他們常常向我們報告敵人的動向和意圖。他們照顧我們受了傷的同志。他們實際上養活我們所有的部隊。我們沒有軍用廚房和糧食倉庫。我們從老百姓那裏拿到什麼就吃什麼。他們很高興地給我們，並且常常拿他們僅有的食物給我們。德國人和烏斯塔西匪徒把村子裏窮人的東西能搶到的都搶去了，可是窮人們仍然把麵包送給我們。在我們認為比較安全的地點，我們常常就跑到老百姓的家裏去吃飯。我們和村子有了聯系，訂下一個制度，依照各個家庭情況，供給一個到三個遊擊隊員的伙食。我記得在莫斯拉維克卡地區，在距離卡斯瑪不遠的達斯卡提斯村子裏，老百姓決定在聖誕節招待遊擊隊。老百姓決定把我們分配到各家庭，我們每人吃到和他們家裏的人相同的一份食物。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離開村子回到山地。在別的地方，當我們認為到村子裏去是冒了不必要的危險的時候，就由村子裏的青年把糧食送到森林裏來給我們，老百姓用這種方法表示他們對於我們遊擊隊的愛，表示他們贊成我們的鬥爭，驅逐希特勒匪幫及其南斯拉夫資產階級同盟者的鬥爭。

很多村子裏的老百姓僅剩下老年人、婦女和兒童，年青男人都到山裏去了。即使在我們僅僅暫時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村子裏，我們也幫助村裏人做家務，和幫助他們種田。我們組織公開的大會，在大會上我們向老百姓解釋我們為什麼而鬥爭。政治指導員常常報告當前情勢。他說明了我們實現我們的理想的日子愈來愈近。他告訴老百姓要怎樣地貢獻他們的力量來勝利地結束戰爭。我們的這些大會，通常總在閉會前總結遊擊戰役經過和唱蘇聯的歌和遊擊隊的歌，是很受到大眾的歡迎的。人民愛我們，也因為我們從來不偷他們的東西，我們只拿他們自願給我們的東西。因為誰都知道，我們如果犯了一點小的過失就要受到很重的處分。可是很少需要處分，因為我們的政治水平提高，使道德水平也提高了。每一個遊擊隊員都用他自己的模範行為向老百姓證明：德國人和烏斯塔西匪徒要世界

上人相信遊擊隊是土匪的宣傳，簡直是胡說八道。

老百姓從各方面照顧我們。他們供給我們食物，在冬天替我們織毛襪子、毛衣、手套，以及供給我們有關德國人、烏斯塔西匪徒以及叛國者的重要的情報，這些都是老百姓對於我們反法西斯的解放鬥爭的貢獻。

我們對於我們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我們走上我們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把佔領者從我國驅逐出去和在南斯拉夫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秩序。我們愚笨的想法認為祇要我們每一個人不斷地通過鑑定，那末在我們當中就不會再有叛徒。

我參加了遊擊隊之後，馬上就通過這樣的一個鑑定。我的過去都經過仔細審查，以便查明我在任何時期是否和敵人有過任何聯系。我的第一次的鑑定，是根據我們地區裏的遊擊隊的代表所做的報告進行的。這些地區代表，我們稱之為「地區代表」的。他們的任務是向遊擊隊報告敵人的動向和意圖、老百姓的情緒、叛徒和與佔領者合作的人的情況以及每一個請求參加遊擊隊的人的過去歷史。地區代表此外還向遊擊隊建議作戰計劃以及如何進行這種計劃。

根據這個報告，把我過去的歷史、目前工作和我對於黨的路線的態度都加以鑑定。像所有的遊擊隊員一樣，從那個時候起，我需要不斷地通過這種鑑定。我們政治上是否可靠，我們對鬥爭是否忠心耿耿的最好的鑑定是看我們怎樣執行交給我們的具體的戰鬥任務。這一項鑑定是由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一同來進行的。我們所有的人，包括非黨員在內，都要通過這種鑑定。鑑定的標準隨着時間愈來愈嚴格。鑑定所規定的任務愈來愈多，並且愈來愈艱難。這種經常鑑定的目的，是要不斷地純潔我們的隊伍，增加我們的戰鬥力量，使我們自覺的紀律性進一步提高，和加強我們的政治認識，這樣我們才能成爲反對希特勒匪幫和烏斯塔西匪徒的最好的戰士，和成爲擁護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最有用的戰士。

今天回想起來我們那種經常的和嚴格的鑑定，使我很驚訝，儘管我們是那樣的警惕，但是在最應當警惕的地方，却忽略了。我們經常地互相鑑定；我們那些單純的普通的人，那些普通的或精銳的遊擊隊裏的基層隊員。我們彼此很嚴格，我們認為只要不斷地提高標準，就能防止叛徒們混入我們的隊伍。我們對於我們的上級，對於上級指揮部，對於指揮鬥爭的領導人物，却麻木大意。我們盲目地相信，地位愈高的工作者，一定是更健全的遊擊戰士，一定是更忠心耿耿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一定是蘇聯的更忠誠的同盟者。今天看起來好像是不可思議的，當初我們互相鑑定時，我們却從來沒有想到進一步要求上級指揮部也進行鑑定，雖則在那個時候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需要這樣做。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蓋伯克一隊的七百個遊擊戰士，在一次進攻後犧牲很重，祇剩下了六七十人，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理由還不夠重大，來對決定使用這一隊人的上級指揮部進行鑑定麼？讓我們再舉無產階級隊的不幸的命運做例子，第十三無產階級隊，隊員都是薩格勒布的最優秀的工人，受到好幾次慘重的損失，不得不補上新的隊員加以改編。但是該隊的軍官，却每次都能奇蹟式地逃出危險。當時我們為什麼不仔細研究一下呢？仔細研究，也許我們就能發現米利奇隱蔽着的秘密，他當時是該隊的軍官，而今天他一身兼任南斯拉夫駐布拉格的代辦和美帝國主義所僱用的特務。也許我們就能保全了我們最優秀的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戰士的生命；而我們及時地揭露上級指揮部裏的叛徒們，也許就能使我們多難的國家，今天沒有必要再來進行解放鬥爭。居上級地位的一羣叛徒們，在當時我們沒有認識，他們在戰後才開始逐漸地慢慢地顯出他們的原形。但不能把這個認為理由，來解釋我們基層遊擊隊員在當時警惕性不高。如果不是由於上層的叛變，那末有很多的在戰時我認為很優秀的政治上極成熟的戰士，今天無疑地一定會無懈怠地參加南斯拉夫的和平的和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這種叛變的結果，使得南斯拉夫最優秀的兒子奄奄一息地被關在鐵托的監牢中，他們被開除黨籍或逃亡國外。他們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反而成為鐵托、蘭科維奇、卡德爾、畢亞德、德熱拉

斯、貝勃萊爾等叛徒集團的犧牲者。他們的人數很多，我僅僅舉出幾個例子。

我記得我的第一個政治教員。他的名字叫做勃拉遜。我在到遊擊隊那裏去的道路上遇到他。他是一個精銳破壞組的指揮。他常常在敵後炸毀火車、橋樑、倉庫、發電廠，和組織對德國軍隊的突擊。勃拉遜的一個組的另一項任務，是吸收新幹部參加遊擊隊。當武裝的敵人攔着我們的路時，勃拉遜對我們一羣徒手者的遊擊隊員講話，他的話幾年來我一直記着。勃拉遜爲了鼓舞我們的戰鬥意志，就囑咐我們說：我們的信念、階級意識、所有的人民和我們站在一起這回事實，就是我們最好的武器——比敵人的高度技術更有力量武器；有了我們的這種武器，就能最後戰勝敵人。我認爲勃拉遜是一個模範的英勇的果敢的遊擊戰士，一個值得欽佩的自覺的政治鬥士，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虔誠信徒，一個全心全意的政治工作者；他的目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他是蘇聯爲範式的。我認爲勃拉遜今天依然是一個模範。我要踏着他的足跡前進和繼承他的鬥爭。當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把南斯拉夫居領導地位的帝國主義特務的真面目向全世界揭露了之後，擁護南斯拉夫站在和平陣營的忠實戰士，就開始被驅逐出黨，從軍隊中、國家機關中和重要的工業職位中被逐漸地撤職，受到迫害、逮捕和酷刑。因此也就輪到了勃拉遜。他從軍隊中被撤職，被驅逐出黨。他被逮捕後就全然不明下落。

特別是從一九四一年起就參加鬥爭和從事組織遊擊隊的老的遊擊戰士，開始都被撤職。德國人佔領德拉提斯尼克的第二天，因爲牧師克羅德和鎮長普利摩斯的告密就被逮捕的維耶奇，這個後來從德國犯人營裏逃了出來的維耶奇，他一開始就站在人民方面反對德國佔領者，可是在一九四九年初，他那時在德拉提斯尼克擔任黨書記，竟被開除出黨。告密人普利摩斯的命運竟然大不相同！戰爭剛剛結束時，他狡猾地逃過了由於他在淪陷時期的活動而受到的人民法庭的處分。後來因爲他在我們的地區宣傳「美國生活方式」和要我們仿照澳大利亞的方式不要仿照蘇聯的方式成立合作農場，真的被判爲「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敵人」。普利摩斯並不因爲過早公開擁護托南斯拉夫的領導方面今天所

奉行的政策的緣故而受到很長久的處罰。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不久，普利摩斯就從監牢中被放出來。他今天在我們的地區所担任的工作，應當由以前受過他迫害的人，像維朗普奇來担任才對。

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許多在戰時曾經和希特勒匪幫合作過的人，例如普利摩斯，從牢獄中被放出來了。曾經被判為戰犯的人，曾經在戰爭中幫助希特勒匪幫進攻過南斯拉夫的人民和遊擊隊的人，從監牢中被放出來了。而被關進監牢裏去的，却是勇敢的遊擊戰士。他們犯了忠於蘇聯、忠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忠於他們的理想的「罪」，為這個理想，他們曾經手執武器而戰鬥。

鐵托政府開始從工業部門中，國家機構中，地方政府中，軍隊的長官集團中，以及其他部門，把遊擊隊和工人出身的幹部逐漸地予以撤職。藉口是必須用專家來代替他們。曾經幹過遊擊隊或工人的幹部就被送回到原來的崗位，或是被送到礦場去，而他們的職位就由「專家」來代替。這批「專家」從前曾被趕走，因為對於勞動人民的利益來說，他們在政治上不可靠，而且他們常常直接地造成禍害和有危險性。所有這一切是逐步地不聲不響地進行的，用意在於不要引起太多的反抗。在虛偽的「民主化」口號之下，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正像工黨在英國所為的一樣。資本主義正在逐步地在南斯拉夫恢復起來。這是違反勞動人民的意志的，違反遊擊戰士和愛國志士的意志的。這些人都已被處死，或被抽下獄，或至少被逐出黨。

告密人普利摩斯的一個親屬，求魯·普利摩斯成了斯羅維尼亞邦東加·連瓦達的一個煉油廠的經理。也不管這個傢伙在戰前早就在那裏油業中的一個巨頭，他那時已經是佔有那裏的油田的德國的和法國的公司的忠實走狗。他拒絕僱用本國的人。他在戰爭期間繼續在煉油廠工作，替納粹服務。戰後為了逃過刑罰和避開別人的注意，有一個時期他担任了地位比較低的工作。就在這個時期，他也暴露了他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僱用的走狗。為了彌補被德國人搶走的機器，我們從蘇聯方面運來機器，透平機和其他的採油設備。這個傢伙把蘇聯的機器形容為比德國的出品低劣，不合於有效率率的採油之